

# 社會轉型期的一種文化現象 ——評《告別革命》

● 長 江

李澤厚、劉再復：《告別革命——  
回望二十世紀中國》（香港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，1995）

李澤厚、劉再復二位先生，是很有影響的著名知識份子。他們用對話形式，共同回望二十世紀中國，以「告別革命」為主題，成書公諸於世。這是很有意思的：記錄了一部分在中國大陸生活很長時間的知識份子的心迹。我把它當作社會轉型期的一種文化現象來閱讀、來思考。

近百年來，特別是近幾十年來的中國大陸，確實被頻繁的政治運動搞得大傷元氣。這些政治運動，都是用「革命」包裝起來的：「革命」的口號、「革命」的標語、「革命」的行動、「革命」的樣板、「革命」的司令部，實際上全都是災難。從這個層面看，提出「告別革命」是有根據的，事出有因。但是，這個層面不足以涵蓋近百年史的整體或主體，

卻是顯而易見的。李、劉二位，當然也不會以這個浮在表皮的歷史泡沫作為立論的基礎。

那末，離開了上述層面，提出「告別革命」有根據嗎？思之再三，怕是查無實據。

## 一 關於要「告別」 的「革命」

《告別革命》一書，講「革命」的地方多達數十處，通通應歸入「告別」之列。法國革命、辛亥革命、五四運動這些大題目不談了，讓歷史學家去爭論吧，這裏，僅列舉一些看得到的事例。

〈序〉中說：

「我們所說的革命，是指以群眾暴力等急劇方式推翻現有制度和現有權威的激烈行動（不包括反對侵略的所謂『民族革命』）。」這是全書對「革命」一詞最為規範的界定。但是，接着又說：「我們決心『告別革命』，既告別來自『左』的革命，

也告別來自「右」的革命。」(頁4)這句話叫人感到莫測高深。「革命」怎樣劃為「左」的和「右」的呢？從全書的前後文看，也許可以作這樣的猜測：「左」的大概指奪取政權的大革命，如法國革命、辛亥革命、新民主主義革命等；「右」的大概指反對政府的「動亂」，如「八九風波」等。但是，書中批評「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廣場」主張「革命到底」的學生們時，卻又說：「誰的革命口號越響亮，誰越左，就越容易煽動群眾。」(頁74)如果這是「左」的革命，那末，「右」的革命又是甚麼呢？

書中說：

「迷信文化批判到了極端，就發動文化大革命。」(頁18)

「所以毛澤東老說『氣可鼓而不可泄』，這也就是不斷革命的依據。」(頁79)

「上個世紀的下半葉，我國老打敗仗，……受了污辱，就會急着要洗去恥辱，急着要『翻身』，『一急就想革命。』(頁74)

「一會是十年超英，一會是十五年超美。我們總是把賭注壓在『革命』上。」(頁74)

「進化論觀念造成二十世紀中國的心理緊張……自我恐慌，急得要命，完全失去一個民族的從容。」(頁75)

恕我直言，這許多對「革命」的闡釋，相當混亂。「文化革命」當然不是因為「迷信文化批判」而發動的。「不斷革命」，更不是以「一鼓作氣」為「依據」。10年、15年超英趕美，時間的估計固然不切合實際，但因為落伍而奮起直追的精神，對於一個求生存、求發展的民

族，卻是不可缺少的，決不能當作「革命」的「賭博」而從容告別。

《告別革命》說：「作改良家不像作革命家，只要一腔熱血視死如歸就行了。」(頁72)對別人的「一腔熱血」，用「只要」和「就行了」這樣的字眼概括，是不是失於輕佻了？

〈序〉中說：「當然中國更不能冒充世界中心而向外輸出革命。」(頁4)我對這一點完全同意。但正如革命不能輸出、不能製造一樣，革命也不能告別。是革命還是改良，這是由歷史發展的各種因素綜合決定的。

## 二 關於要「遵循」的「歷史」

對當前中國社會發展，《告別革命》提出了一個「四步順序」論：



近幾十年來的中國大陸被頻繁的政治運動搞得大傷元氣，從這個層面看，提出「告別革命」是有根據的。但正如革命不能輸出、不能製造一樣，革命也不能告別。是革命還是改良，這是由歷史發展的各種因素綜合決定的。

《告別革命》批評了過於強調歷史必然性、忽略歷史偶然性的「歷史宿命論」，認為這是「歷史意志」；可是它提出的「四步論」，為當代中國史安排了一個具體時間表，給人有一種從計劃經濟步入「計劃歷史」的感覺。

據我所知，中國知識份子似乎從未有過佔據中心位置的時候，如果一定要說知識份子曾扮演過「中心」的角色，那就是在每一場大批判運動中，他們倒是萬箭齊射的箭靶子。

「發展經濟是第一步」，「第二步將是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增多個人自由」，「達到這一步之後，才應較響亮地提出『社會正義』問題，而最後才是『政治民主』問題」。「所以我說的經濟發展→個人自由→社會正義→政治民主，既是大致的四個邏輯程序，也是大致的時間（歷史）順序。」儘管書中提及這個順序「當然不一定那麼死，因為它們經常滲透交織在一起，互為因果」（頁23、24）。但是，這樣一個十分重要的補充說明，在論述中基本上被遺忘了。

書中強調：「政治民主是經濟發展、個人自由、社會正義的結果，像民選總統，反對黨（多黨）制度等政治民主的確重要，但遠不是當前中國現實所急需。現在如實行這些東西，反而會糟糕。」（頁24）

從這段論述來看，似乎還算實際。如果是「當前中國」，搞民選總統、反對黨制度等等，確實遠不是現實所急需。可是，《告別革命》所講的「政治民主」，並非僅僅指這些東西，書中寫道：「政治當然要改革，但要有改革的經濟基礎，政治才能改革好。」（頁33）這裏講的是政治改革，而且它也要按「四步論」運行，要等到政治改革的經濟基礎形成後才能進行。那末，這個經濟基礎的標準是甚麼呢？中國大陸的改革實踐已經非常明確地證明：經濟改革必須有政治改革與之配套才能健全進行。這是連鄧小平先生都有明確的論述的。

《告別革命》批評了過於強調歷史必然性、忽略歷史偶然性的「歷史宿命論」，認為這是「歷史意志」：

可是它提出的「四步論」，為當代中國史安排了一個具體時間表，給人有一種從計劃經濟步入「計劃歷史」的感覺。

「四步論」，實質上是一步論：只搞經濟，不搞別的。如果現實真的如此，恐怕經濟也不能持續發展下去，結果是，連第一步也要成為泡影。

### 三 關於要「移動」的「位置」

《告別革命》提出：「知識份子要從中心位置向邊緣位置移動」，「完成不了這種移動，還想當中心，想負天下興亡之大任，就會在社會變化面前感到很痛苦，充滿失落感。」（頁56、57）

「知識份子有一點要充分意識到，就是走進現代社會之後，就不能再當英雄，再當歷史的主角出大風頭了。」（頁56）

據我所知，中國知識份子似乎從未有過佔據中心位置的時候，即使是極少數出名的大家，也不例外。如果一定要說知識份子曾扮演過「中心」的角色，那就是在每一場大批判運動中，他們倒是處在「中心位置」的，這個「中心位置」便是萬箭齊射的箭靶子。似乎一切壞事，都可以從知識份子身上找到源頭。

《告別革命》警告說：知識份子要趕快從中心位置向邊緣位置轉移，否則「就會感到痛苦」。為甚麼痛苦呢？因為「想負天下興亡之大任」而不可得？因為「想大出風頭」

而不可得？這樣的論點，無論對中國知識份子還是對他們當前所處的中國的時代，都是不切合實際的。

今天的中國，正需要它的知識份子加強社會責任感，這不是因為「出大風頭」的念頭所驅使，而是出於知識份子的良心。

《告別革命》勸告說：「不當英雄，不當王者，不是沒有出路。出路是自己的專業。」(頁60)這是對的，只是還不是全部。知識份子除了要有自己的專業外，還要有社會的責任。這是因為，今天的中國，還沒有進入《告別革命》所描寫的黑格爾所說的「散文時代」。

#### 四 關於要「加強」的「權威」

《告別革命》提出：「中央需要有權威、有權力，所以我重視中央以及各級政府的權威。現在已經很弱，再弱就會對社會失控，就很危險。」(頁24)這段論述，至少存在三個問題：第一、權威指甚麼樣的權威，權威從何而來，權威怎樣形成；第二、權力是誰給的，權力怎樣使用；第三、中央的權威現在已經很弱，是指那一方面很弱，為甚麼會弱，怎樣才算不弱。

對於上述問題，《告別革命》提供了部分回答：「我現在倒願意強調目前要保持一定的國有資產，否則政府權威和宏觀調控就會失去足夠的基礎和必要的力量。」(頁42)如果我沒有領會錯的話，《告別革命》要加強的中央權威和權力，是指經濟上宏觀調控，也就是現在大陸流

行的所謂「強財政」的說法。宏觀調控是任何國家都需要的，更何況是社會主義國家。問題是用甚麼路子調控，怎樣調控。

書中有一段講袁世凱的論述，可以幫助讀者了解上述思想：「當時一些著名知識份子之所以支持他當皇帝，就是希望有一個絕對權威來制止分裂，以集中力量建設國家。」但袁世凱卻根本無意於建設，只一心想當皇帝。」(頁70)

對於一個政權來說，經濟建設絕對不是孤立的功能。即使昏庸如袁世凱，照其初衷，恐怕也希望他的王朝是富裕而不是貧困的。他沒有搞好經濟，決不僅僅是他「無意」，而是因為決定經濟的還有經濟以外的東西。拿中國大陸來講吧，幾十年經濟沒有搞好，難道是因為領導人沒有經濟建設的意思嗎？是因為中央權威不夠嗎？恐怕恰恰相反，正因為權威太大了。

《告別革命》有一段善美的描述，中國「不斷調整、建設，不斷調和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，以追求人民富裕國家繁榮為目標，這自然就會好起來」(頁32-33)。

這真正是難以仿效的少女般的天真！

權威是要愛護的，愛護權威最好的、恐怕也是唯一正確的途徑就是監督！沒有監督的權威是危險的。

講加強權威，不一定不對，但必須是有條件的。這個條件便是人民的監督。不講條件而一味強調加強權威，會被理解為擁護專制。

中國大陸幾十年經濟沒有搞好，難道是因為中央權威不夠嗎？恐怕恰恰相反，正因為權威太大了。權威是要愛護的，但沒有監督的權威是危險的。不講條件而一味強調加強權威，會被理解為擁護專制。